

马克思主义、人文学和神学的交会与 朝向未来的文化反思

——“马克思主义、人文学研究与神学问题” 国际研讨班会议综述

Convergence of Marxism, Humanistic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Issues and Cultural Reflection toward the Future
——A Summary of Summer Institute on “Marxism, Humanistic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Issues”

285

周丹

ZHOU D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convergence of Marxism, humanistic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issues in the West. Contemporary Marxism, humanistic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alike are characterized by a political dimension, an interchange of perspectives in their research, and a radicalization in their thinking. Lively debates

have arisen from differences in their theoretical traditions and models of interpretation. As Marxist, humanistic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engage in rediscovering and reinterpreting Western thought, they have also engaged in mutual dialogue and cultural reflection,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cor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a joint effort to find alternatives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ummer Institute on Marxism, Humanistic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Issues was held on July 30—August 2, 2010 at Xiangtan University in Hunan Province. It was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of Renmin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Xiangtan Universi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Distinguished scholars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aiwan Zhongyua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Glasgow of UK, University of Stirling of UK, and Baylor University of USA lectur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topics to more than 60 young faculty members of over 40 universitie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The lectures covered subjects such as: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in light of religious ethics; the theological turn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and the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history; advancing toward the future in reflections and debates, etc.

Keywords: Marxism, Humanistic Studies, Theological Issues, Convergence, Reflection

一、宗教伦理视野中的友谊政治学构想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大卫·贾斯帕（David Jasper）做了题为《后基督教西方的友谊政治学》的讲座，提出重新讨论后启蒙时期的状况和基督教，并寻求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来构建友谊政治学。贾斯帕教授检验将当下西方文化状况界定为后基督教的说法。西方文化及其政治学的历史、延续都是由基督教引导的，其政治的双重性一方面在于其被动的内在性和对倾空自我的爱的施予，另一方面这种爱的施予与好斗的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即一种维持教会与国家两者不同程度的权威和制约之权力结构的客观主义相结合。而后基督教这个说法表达出爱的施予对强迫性权力因素的消解。基督教的爱的传统起源于神圣的自我给予的行为，这是我们在世俗化的核心中恢复基督教和建立友谊政治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得根据智力、科学与宗教信仰的结构和教条的力量而构成的诸多形而上学走向解体。

在贾斯帕教授的讲座中，友谊政治学的信仰基础、人性基础和实践方式得到清晰阐释。友谊政治学的信仰基础植根于基督教的“kenosis”，即上帝通过自我倾空进入人类处境，这使基督教以虚弱的形式出现并宣称元叙述学的终结的真理。人类只有在爱他人和充满博爱的友谊中，才能承当虚弱并主动地参与到展现我们之多样性的活动中。因而我们并非信仰的造物，而是可以在不受教条或根深蒂固的客观性所钳制的友谊中商讨、解释、分享和重新发现，拥有一种无尽地朝他者开放的信仰。友谊政治学的人性基础是被基督教赋予谦卑、自我否定和献身他人等内涵的德性（virtue），这要求人类秉持放弃客观主义形而上学所提供的一切

确定性的勇气，在互动的计划和友好的实践性商讨中进行思想的自由冒险、延伸和追问。友谊政治学的实践方式是礼拜仪式的，这不再是从事崇拜行动的技术特性，而是要求人们不断将基督教的圣餐仪式作为引导自身思考和行动的在场的事件，并在对有效行动的共同参与中克服障碍和强制性，致力于创建一种和睦共处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此外，友谊政治学的复兴需要人们朝向未来，通过对过去的怀念和反思团结起来，在不断的质疑和解释中承载对当前的全部责任并呈现未来的希望。

英国斯特林大学艾莉森·贾斯帕（Alison Jasper）在《女性天才与西方基督教历史》中提出，要以更广阔的社会正义和平等的眼光关注女性个体的自主性。艾莉森反驳波伏娃认为西方女性没有历史和宗教、女性之间缺乏群体性或阶级性的团结来满足她们的需要和实现抱负等观点，指出应当超越圣经语境并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中解读女性的在场/不在场的矛盾性。艾莉森接受克里斯蒂娃的观点讨论女性天才，并提出应当认定那些以基督教为背景、并对基督教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的女性的成就。女性天才指的是女性在毫无希望的环境中有意识地承担主体地位而取得的成就，这就应当结合女性作为母亲和女性的特定身份来考虑语境和诸多成就的类型之因素来衡量女性天才的创造性和成就。对于女性来说，女性主体性地位的问题是关于差异的哲学根本论题，而不是关于平等的实践性的政治论题。因此对女性天才的考察需要与绝对的排他性的男性/女性的二分法分道扬镳，这种二分法使女性主体性体现为不明确的母性并使男性主体被局限在语言和象征的表现形式中。女性天才的领域在于，女性意识到自身有着从男性的眼光来看的局限性，但努力摆脱对男性话语的依赖，而是在坚持自身与男性在情感、愿望和斗争等方面的差异的同时认识到自身

能力，获得并建立主体性地位。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神学“转向” 和基督教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式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在《特里·伊格尔顿的神学“转向”》中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近年来的思想有着明确的“转向”意识即“形而上学转向或神学转向(或回归)”，并提供大量令人信服的关于伊格尔顿思想转向的证据和理由。耿幼壮教授提出，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始于对基督教神学的关注，其早期思想的中心主题是“显露出在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和歧异”。从伊格尔顿后期理论探讨来看，“回归”可能比“转向”更为准确地描述伊格尔顿近年来思考和写作的方向与其早期思想之间的联系。耿幼壮教授围绕着伊格尔顿在近著中提出的“为什么那些似乎最不可能的人，包括我自己的在内，忽然谈论起上帝”的问题，梳理伊格尔顿的“转向”或“回归”来参与对当前神学和人文学的问题的讨论。在耿幼壮教授看来，身体处于伊格尔顿神学思想的中心，圣餐仪式则是其起点，伊格尔顿由此进入到交流与他者、爱与希望、正义与未来，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和必要构成的死亡、恶、暴力与革命等问题。身体的血肉之躯作为象征交往的手段，对于基督教来说，这个象征并非与真实界相分离。伊格尔顿在耶稣受难中看到革命的原因。耶稣身体蒙受的苦难是手段，这已经不再是神学问题，而是成为悲剧的另一个原因。耶稣遭受的苦难转变为荣耀的手段，这表明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和花招。耶稣并不主张

人类消极和无所作为地忍受贫困和苦难，贫困和苦难并不能对世界有所改变，却是将生命挤压到无意义状态，人类生活由此堕落到地狱的极限，在这种人类生存的境况下采取补救或逃避的方式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耶稣并不主张激进的革命，耶稣与罗马帝国公然对抗的革命性，是通过其行为与个性体现出来的。圣餐面包则是耶稣的身体，人们通过圣餐仪式把握这种物质符号，使耶稣的再生成为精神获得拯救的源泉。圣餐仪式暗示着基督徒如果不对抗当权者，就是对自身使命的不忠。耿幼壮教授得出结论，伊格尔顿对圣餐仪式的解释完成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过渡，这样语言与身体结合为一个生命而构成对未来的明确象征，从而将人类的拯救落实在改变人类状况的未来向度中。

290 美国贝勒大学丹尼尔·威廉姆斯教授(Daniel Williams)的《考茨基关于古代基督教的社会历史观》从历史研究出发向广阔的意识形态和神学延伸。威廉姆斯教授关注的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圣经和教会出现的社会与经济的语境进行的重新建构。威廉姆斯教授并不着意评判考茨基将早期基督教作为古代社会主义模式的做法，而是考察19世纪和20世纪的神学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精神气质的形成发生影响的深程度。

威廉姆斯教授认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还要归因于当时德国圣经研究和神学倾向。考茨基遵循的原则是让历史和宗教的话语在现代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威廉姆斯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有着反对宗教的倾向，反对的理由是宗教最终将随着进步的显现而消失。马克思虽然极少对宗教予以言说，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属于宗教的问题本质上是社会中的问题。

宗教被认为是压迫者们利用的工具，可以让那些由于贫困和被剥削而感到痛苦的人们得到精神抚慰。宗教阻止人们客观地看待物质现实，人们对社会物质状况的批判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宗教批判。考茨基接受这些观点，但是他主张宗教在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发挥的是偶然作用，从而将这些观点引向不同的方向。在考茨基看来，基督教的出现是对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一种反应，人们应当切断基督教的那些神秘的和传说的添加成分，对之进行历史性的物质主义分析。作为一种无产阶级运动，早期基督教发出对富人的憎恨，表现出与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愿望一致的反对现有社会体制和反神职的特性，但是却主张信徒放弃一切而加入团体所组成的一种共同生活。在威廉姆斯教授看来，考茨基仍然相信早期基督教的革命特征，这些革命特征分别体现为迎接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弥赛亚期待、共产主义的实践和对家庭的敌视。但考茨基更多的是从字面上对圣经予以解读，把新约看作早期基督教共同体的精确描述，把福音书视为政治神话，而忽略以圣经重建历史的可靠性问题。这提出要协调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传统与现代批判理性之间关系的必要。

考茨基并不依赖当时对历史学意义上耶稣形象的言行的解释，要求人们不应期待从福音书中发现关于耶稣生平的传记。但考茨基对圣经文本的历史真实性的拒斥和他运用同样的文本进行历史观察之间有着断裂，考茨基的立场表明他从德国圣经学者那里继承了对圣经文本的怀疑论，这个问题在当代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威廉姆斯教授指出，考茨基的观点描述了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运动是从未分化到分化、从简单到复杂、从共享的和谐到主教制度等级的和教义的权威主义的运动，其质朴性、自发的精神性和共同领导权等特征在扩张过程中逐步淡化。考茨基从

对早期基督教历史发展的描述逐渐转向对教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政治批评。耶稣运动的原发性革命冲动丧失和基督教共产主义衰落，此时教会政治力量产生、教会等级制度形成、基督教宗教团体的权威与解释圣经的权威确立。神学的功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为教会内部正在进行的更深层次上的政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的托词，这样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性描述就被简化为对反对者实施的对抗。考茨基坚持认为，初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运用无神论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的只是政教分离。考茨基对古代基督教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的重建表明他构想的共产主义是对当时多种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校正。这却表明，对基督教起源的历史性解释的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把握其内在的错综复杂。

威廉姆斯教授分析考茨基的思想并得出结论，考茨基的思想提供的是 20 世纪早期德国社会主义思潮，而非早期基督教思潮。考茨基在德国自由主义学术观点的影响下，运用比德国自由主义更为欠缺严谨性的历史的、原型的、以文本为基础的分析，这使考茨基的研究有着方法论的自相矛盾。然而上述这些特性却仍然存在于拒绝德国自由主义的后来的 20 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探究中。

三、在反思、对话与交锋中走向未来

美国贝勒大学大卫·杰弗瑞教授 (David Jeffery)《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交汇：质疑后现代自由主义》阐明人文学科的思想危机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者/基督教的批判，寻求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实现更具普遍性的交汇的确切可能性，为文化批评和对话

做好准备。

杰弗瑞教授分析人文学科中的思想危机。人们质疑当代大学并不具有清晰表达文化使命感的能力。这种责任的放弃在大学生群体中导致令人担忧的无政府主义的放任、狭隘的本位主义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在许多学科中，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性别政治和生态批评取代大部分的课程内容，这已经成为规范。这使大学的思想生活通过争取特殊的利益群体实现殖民化，牺牲人类思想文化整体的健全和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切中肯綮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在20世纪后半期自然而然地出现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权力“下放”。这意味着，那种认定文化的形成在于我们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发生关联的特定视角遭到损毁，或者受到某些狭隘的个体主义利益的支配。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都应给予我们可以呼吁“公众理想”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把宗教批判作为一切文化批判的前提，作为一种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发现宗教的一切形式都与它为社会进步所提出的各种机制是格格不入的。不过马克思的主要观点都来自当时欧洲宗教团体的争论，马克思看到，启蒙时期之后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的改革大大削弱宗教的、尤其是圣经的权威性，僵化的国家教会在抑制而非促进社会自由。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当时的宗教教条和教会滞后的批判。马克思洞察欧洲国家教会发展的后果是权威和超验性的丧失，由此建议激进的社会世俗化。马克思准确地预见到迅速世俗化的欧洲基督教不可避免的失败，世俗化的基督教不再能有效地批判文化而是变成世俗文化的另一方面，并且作为组织结构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而逐渐衰弱。在当代的西方大学里，基督教神学作为一种权威已经被边缘化，神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分离开来。然而某些人文学科从

与神学的辩证关系中解放出来后就变成宗教的替代品。人文学科的膨胀使更细分的专业（如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多元文化研究）出现，并引发主流学科重新转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却从更广阔的全球化文化的综合性视野中转移开去。当代文化在大学语境中总是逃避那些不可通约的对话，这损害着哲学严肃地反思从学科间的思想形成和对话到公益事务的一切问题，而派系性主张的排他主义、极端主义和夸大则带来人文学权威的丧失。杰弗瑞教授指出，人们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标要求用历史性眼光来看待思想的现代性，恰如其分的做法是人们对那种迎合公众认同而孤注一掷地提供不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和道德目标、甚至是世俗的超验性的学科展开特定批评，以此思考公众批评。

杰弗瑞教授接着对中国学者关于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做出回应。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以特殊的强有力方式带来现代性，杰弗瑞教授认为其思想根基主要是物质主义的而非超验的预设，这使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评并不那么有效。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批评那种体现西方后现代文化很多特征但已经退化的自由观念，却冒着在最坏情况下放任个人贪婪和私人欲望破坏公众的理想主义的风险。以近代历史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放弃“神定”的概念，却在实践中对人类自由的态度充满矛盾。杰弗瑞教授将这种矛盾归因于超验性范畴的丧失。西方衰颓的自由主义倾向于将自由化约为一种低层次的选择和道德许可。这涉及对自由概念的定义，目前无论对于后现代西方还是更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模式来说，都需要提供一种对人类自由的解释来抵制化约。对于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的自由观念的怀疑，杰弗瑞教授进行分析。基督教把自由看作“慷慨”和为他人利益的忘我精神，但这已经被西方近年来注重自主性和选择的个人主义观

点涂改，正如马克思描述的要从束缚中解放人类的圣经式理想在某些方面也被涂改一样。人们看见到处是自由被剥夺的证据，意识到开明的自由理想并不充分，从而把信仰看作自由的源泉和通往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对自由依赖超验性的领会，这在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中有所预示，但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却还尚未被认识到，结果是人们感到失望。杰弗瑞教授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由此产生的悲观主义情绪是全球性的后现代主义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基督教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能够就此寻找对话的基础。人们致力于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历史性思想关联，可能会激发出应对消费主义的个人主义与自我放纵的更有建设性和更有成效的可选方案。

台湾中原大学曾庆豹研究员在《奇迹总会发生——巴迪乌重读保罗》中，通过梳理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对保罗的解读来廓清保罗思想的当代意义。巴迪乌解读保罗并非出于宗教兴趣，而是将保罗思想作为革命的行动资源，重视保罗的政治观和保罗文本中的政治现实。曾教授探讨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考察巴迪乌解读保罗的文化语境和问题意识。任何历史哲学（无论是唯物论的历史哲学还是神学的历史哲学）都在终极形象的维度下深切地反省人类在现实处境中的危机，为未来寻求拯救的出路。这需要历史唯物论与神学的思想合作，共同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精巧结构对人类生存与思想的压制。巴迪乌对保罗的重新解读，意在探寻人类实现救赎的思想进路。保罗的《罗马书》奠定基督教（福音）与犹太教（律法）的差别，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中，人们通过对《罗马书》的释义和争议促成人类思想发展的重大变革。然而关于保罗的探讨和研究主要是在基督教神学领域内进行的，近年来人们突破哲学与神学之间的界限来重读保

罗，以“激进”的方式让保罗思想走出建制性的教会，力图把握保罗或基督教思想在当代思想中的发展动向与问题。当代思想的“保罗热潮”分别有“代表着‘犹太弥赛亚思想’进路的陶伯斯与阿冈本”和“代表着‘激进的列宁主义’进路的巴迪乌和齐泽克”的两条思想理路。对巴迪乌而言，保罗作为一个真理事件的革命家，为普遍主义打下基础。由此巴迪乌通过对保罗的解读将真理与普遍主义挂钩并描述普遍真理，关注真理正式的程序。在曾教授看来，巴迪乌对保罗的解读在于将基督教“作为‘普遍性’的真理—事件之例证”。保罗思想中恩典对法则的超越，倡导的是不分种族和阶级差异的普遍性的平等。由此巴迪乌虽然尊重和接受差异，但主张从差异中发现新的身份来超越现有的身份以及世界生产的他性的身份。巴迪乌阅读出保罗思想中的政治性，将保罗与列宁连接起来，并以保罗思想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与身份政治的批判给出一个“事件”来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依据。巴迪乌在后现代语境中强调“普遍主义”，是希望对“真理”的主张开启一个超越差异的现实处境。巴迪乌通过保罗找到“普遍主义”并恢复真理的观念，回到与主体性、真理和事件息息相关对于“复活”的宣称。在巴迪乌看来，真实是以一种打破旧有的限制和独立为姿态，以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并实现这种介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转换。保罗的普遍主义即在于真理的未完成性，事件的发生不过是它的起源，主体对它的宣讲即是通过其创新的可能性以予实现。巴迪乌强调基督教复活的“事实”的重要性是与普遍性相关的，认为保罗的有力立场是不从神迹的角度来理解“复活”，而是中断复活与死亡的辩证关系，大胆地将基督教的这个讯息化约为一个主观的宣称，打破客观的可能性，把真理的内容依托对“复活”事件的真诚的主观坚持，注重其思想中真理程序在可能

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转移。曾庆豹研究员认为，虽然保罗宣称基督的事件是愚昧、蠢笨、软弱的，巴迪乌的解读却将保罗思想付诸新的意义，将取代理性和秩序的能力和内涵赋予基督教的事件，展现出打破现状的力度和超越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在讲座《谁更激进——齐泽克与米尔班克的交锋》中，首先对贾斯帕教授演讲中的友谊（friendship）、好客（hospitality）、赠予（gift）和给予（givenness）等关键词进行回应。这些关键词的深层次指向的并非道德诉求，而是关涉形而上学、哲学和神学的概念。这些关键词涉及宗教的政治伦理维度，它们都与关系的政治学（politics of relation）相关联，而相关性（co-relation）本身就是友谊。但贾斯帕教授的友谊政治学导向的是单向主体的自我放弃，对单向主体和单个主体的超越，超越单向主义才能由对“存在”的追究转向对“事件的存在”的追究。

“事件的存在”关注的是“发生”，这将改变德里达关于给予的不可能性的说法。如果爱你的敌人体现出的是爱的不可能性，这便使对“事件的存在”的追究与对爱的给予的讨论关联起来，从而在不可能性中寻求可能性。由此当神学家进入深层次的问题探究时，就很可能被视为反宗教的。其次，杨慧林教授对曾庆豹研究员的演讲进行回应。杨教授将曾庆豹教授对阿兰·巴迪乌的解读归纳为三个问题。一是保罗与列宁的关系，巴迪乌与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都相信保罗与列宁分别开创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信仰传统。二是事件被宣告而成为事件。三是主体很难达成普遍性，主体只有结成关系并通过关系才能超越差异性，确认普遍性的事件并追寻“真理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问题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神学和政治学谈论基督教的构想，这还需要与神学家展开对话。基督教作为真理程序的原型，能够给人文学

提供象征和参照，以便于我们从差异中找到相似的意义结构。再次，杨慧林教授回应齐泽克的思想。齐泽克将当代文化总结为四个过时：超验主体的过时、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平等的政治过时、传统的宗教过时。但是当代文化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完全相反，人们应当回到传统和保守的东西中寻找资源。但齐泽克不同于列维纳斯和克劳代尔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而是认定真理的结构就是建构，从而相信有真理的存在。齐泽克重新讨论马克思，在将一切政治化的同时反对宗教过时论。齐泽克通过反向的阅读来讨论宗教和马克思，用齐泽克的话可概括为“象征性权威身份的确立要以经验主体的死亡为代价”，这意味着意义结构与叙述系统的原型有密切关系。以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为代表的激进神学（Radical Orthodoxy）同样关注反向阅读，他们提出的新神学是以非神学的方式表达神学，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文化都有神学。齐泽克则指出世俗性与现代性是反向的，并声称他比米尔班克更像基督徒。齐泽克讨论的是死亡与生存的辩证法，米尔班克则强调超越目的和超越辩证法的无限自由。齐泽克宣称事物本来就是适其所在，背后没有什么潜在的神意，这样唯物主义的神学的政治成为必要。巴迪乌就曾提到“唯一的例外”即道成肉身来延续我们共同确认的真实。然而人们更愿意接受没有经过批判的断言，却不相信上帝存在所导致的结果。这是由于自然的解释比超自然的干预更有意思。人们失去确保意义的超越性的上帝，得到的是死之前始终参与的上帝，这使人类自身必须承担责任和后果。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解释的就是这一切，很显然齐泽克以辩证的反转来解读黑格尔，从而达到人与上帝的修好。人表现为个体的人，外在的人，有肉身的人，但是却不可能界定自身。人类将自身交托给基督，让生命与神圣的理性一致来达到与上帝的修

好。黑格尔认为并不存在某个主体，但是只有当那些愿意尊奉法制的人们变成碎片后，才能使神圣显现在人类群体之中，达到个人与群体、理性与神圣的一致。这样自在的表达变成自为的表达，从而超越人类历史的本体，使个人的行为变成神圣的集体的行动。但这仍然要解决主体的设定问题。主体的设定是单向行为，但单向主体必须被色划定，即主体与主体性的合一。宗教原型就是人与上帝的合一，爱由单向的施予行为向作为整体的爱的本身转变。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可以做”，齐泽克和拉克对宗教的批判性反思得出的结论却是“如果一切都是上帝，那么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外在的权威，人类就会采纳自己的道德空间。人类追求快乐，就必须要为此承担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一个享乐者要受到更多的约束。然而当人类将此转化为对外在权威的超越，即当人类服从更高意志时，人类的一切行为便具有合法性。既然存在着人性恶，那么人类就应该替天行道，人类将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神圣的理由。没有神圣的理由，人类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宗教的存在为人类行为提供神圣理由，驱使其他人遵从某行动者的诉求。历史的进步论者基于人类的基本弱点认定信仰的惯性，巴迪乌说过人类总是忠于一个不确定的事件，各种秩序、各种权威和意识形态都是大众信仰的方式。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我的父，为什么抛弃我”，或许在这个瞬间，上帝本身不相信自己。齐泽克将之解读为基督教是无神论神学，来自纯粹和超验的秩序将稳定的秩序交付经验主体。抛弃信仰和神话就是抛弃历史的神话。对于齐泽克和米尔班克来说，圣经被认为是具有稳定意义的文本，或许就在于通过对圣经的解读能更好地将基督教的信仰、超验与历史进程关联起来。齐泽克更着重信仰传统与意义的生成方式之间的关系，米尔班克关注的是同样的

问题，却都强调与思想传统的相异之处。米尔班克从传统神学转向世俗经验，但根本意图在于使神学回到当代论争的核心即对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探讨，并以三一论中的基督论来加以重塑。齐泽克认定基督教与基督教神学都具有原型意义，马克思的方法而非具体理论同样具有原型意义。杨慧林教授最后指出齐泽克并非宣扬救世主义，而是从其教义与结构中发现意义生成原型，使唯物主义、“木偶”与神学可以联手，这是其思想的意义所在。如果说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有死结的话，那么米尔班克和齐泽克都试图解开死结，提供意义生成的原型以重新解说意义问题。或许在否定的情况下引入肯定的价值关系即寻求生成性的价值关系，是人类未来面临的任务。

四、研讨的其他问题

本期暑期研讨班收到与会的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提交的学术论文共计 48 篇，并结集成册。这些学术论文主要分为几个主题：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31 篇）、圣经文学的解读（10 篇）、马克思主义与神学问题的思考（7 篇）。研讨班上大家争相提问、发言，进行热烈讨论和积极交流，效果良好。

作者简介：周丹，南昌大学。Email: zhoudany1996@sina.com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ou Dan, Nanchang University.